

英国生活成本危机与英国改革党的崛起

赵晓璇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DOI:10.61369/SE.2025090044

摘 要 : 英国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生活成本危机, 能源价格飙升、通胀高企、住房成本持续攀升, 使成千上万家庭陷入“工作却依然贫困”的艰难境地。这场危机不仅暴露了英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包括对外部能源的过度依赖、住房市场的严重失衡与公共服务的持续紧缩——更在社会层面引发了广泛的焦虑与不满。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 英国改革党 (Reform UK) 凭借其直击痛点的民粹主张和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迅速崛起, 不仅重塑了英国的政党格局, 也对传统的保守党与工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活成本危机与政治回应之间的张力, 正成为推动英国社会走向重构的关键力量。

关 键 词 : 生活成本危机; 社会危机; “工作贫困”; 英国改革党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in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Reform UK

Zhao Xiaoxu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The United Kingdom is undergoing its most severe cost-of-living crisis in decades. Rising energy prices, persistent inflation, and escalating housing costs have pushed millions into “Working Poor,” where employment no longer guarantees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The crisis exposes structural weaknesses in the British economy—such as reliance on imported energy, distortions in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e legacy of austerity—while fueling widespread social discontent. In this context, Reform UK has gained rapid momentum, advancing populist narratives that resonate with public concerns and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dominance of the Conservatives and Labou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hardship and political response has become a decisive force reshaping British society.

Keywords : cost of living crisis; social crisis; “Working Poor”; Reform UK

一、“工作贫困” (Working Poor) 现象与生活成本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8年这十年被英国调查机构认定为“失去的十年” (Lost decade)^[1], 整整十年间, 英国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这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 相当于工薪阶层“停滞了十年”。到2018年, 虽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但由于生产率停滞和通胀等因素,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平均周薪在2018年时仍低于2008年的水平。这意味着普通英国人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 并没有回到原点。

但英国的困境不仅在于历经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 更在于这段“失去的十年”之后, 未能迎来补偿性的复苏。新冠疫情消耗掉了英国仅剩不多的公共资源, 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更是让英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深陷于结构性的困局——低生产率、投资乏力、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日益沉重的公共服务负担,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如同无形的枷锁, 将民众生活水平牢牢禁锢在难以突破的低谷。

(一) 英国生活成本危机的爆发与加剧

2021年底, 受疫情影响, 英国通胀率开始快速上升,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 天然气批发价格飙升, 英国能源账单在2022年4月大幅上涨, 被认为是生活成本危机的真正爆发点。到2022年秋天, 通胀率达到11.1%, 为英国40年以来最高点, 与此同时, 名义工资平均增幅约6%左右, 明显低于通胀水平。实际工资连续下跌, 相当于工人拿到的钱虽然更多, 但同样价值能买到的东西更少, 大量家庭难以支付取暖费和食品费用。2022至2023年, 危机不断持续, 企业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引发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 部分能源企业利润在危机期间增长了200%以上^[2]。民众面临“工资跟不上物价”的困局。虽然政府提供了能源价格保障, 但家庭能源账单依然比疫情前高出一倍以上。房租的持续走高也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尽管发布的通胀指标在2024-2025年度恢复至相对正常区间, 但生活成本危机并未真正结束。从经济结构来看, 危机暴露并固化了英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对外部能源市场的高度依赖, 使得家庭能源支出仍然容易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 二是住房市场长期供给不足与利率敏感性过高, 导致住房成

作者简介: 赵晓璇 (1996.11—), 女, 汉族, 山东济南人, 博士, 博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英国政党, 左翼思潮, 福利国家等。

本在危机后依旧维持在历史高位；三是公共财政长期紧缩的遗产，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缺乏足够的“自动稳定器”，难以在危机过后迅速修复民生保障功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英国住房市场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结构性扭曲：在公共住房供给持续不足、金融宽松政策推高资产价格以及住房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房价与租金的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实际收入的增长^[3]。这导致低收入群体住房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攀升，住房逐渐从一种社会性保障转变为金融性资产，形成制度性不平等的固化。与此同时，危机后的财政紧缩政策限制了社会住房建设与福利性住房补贴的扩展，使得住房市场调节更依赖私人租赁部门，从而进一步抬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2020年以来，能源价格冲击、通胀回升以及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使住房支出压力在极短时间内急剧放大，说明住房成本已成为生活成本危机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英国食品银行（Trussell Trust）报告显示，2022到2024期间食物银行的使用量创历史新高。更加严峻的形势是，在食物银行发放的紧急食品包裹中，有工作的家庭比例显著上升。该组织2023–2024年度发放超过300万份紧急食品包，受援者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至少有一名成年人有工作”的家庭。“就业不再等于摆脱贫困”，越来越多的工薪家庭陷入“有工作但依然买不起基本生活品”的工作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很多人虽然全职或兼职就业，但工资增长长期落后于通胀速度，收入依然无法支付不断上涨的房租、能源和食品账单。学者们将英国描述为“高就业率，低支付能力”经济模式。

（二）生活成本危机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生活成本危机对英国各个社会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危机的影响对象分布极不均衡，呈现出鲜明的“剪刀差”效应。低收入家庭受冲击最严重，因其将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能源和食品等必需品，而这类商品通胀最高，几乎没有储蓄“缓冲”；中产家庭面临两难困境，他们的收入刚好超过获取政府补贴的资格线，但却被抵押贷款、还款激增等因素严重挤压可支配收入，实质上是“有产无钱”的阶层^[4]；年轻人和租客则面临租金高和储蓄难的双重压力，购房梦想更加遥远；养老金领取者虽享受与通胀挂钩的国家养老金增长，但固定收入难以应对日常开支的飙升，尤其需为供暖支付更多费用；能源成本、贷款利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利润，使得很多小企业与个体户难以为继。

保守党政府在生活成本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性措施，例如在2022–2023年设立能源价格保障、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以及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额外的取暖津贴。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缓解了部分家庭的账单压力，但存在几个明显局限。首先，政策缺乏长期性，能源补贴和一次性救济属于短期纾困，而住房供给不足、工资长期停滞等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5]；其次，福利体系的覆盖有限，长期紧缩政策削弱了社会保障的普惠性，许多“在职贫困”家庭并不符合严格的救济条件，导致政策难以触及最脆弱群体；再次，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不足，英格兰银行为抑制通胀持续加息，但政府并未同步出台有效的工资增长或住房市场改革政策。结果是，利率上升带来的房贷月供压力抵消了

部分补贴的效果，使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依然难以维持生计。

2024年斯塔默（Keir Stamer）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确实推出了一系列应对生活成本和社会不平等的政策，但短期收效有限。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报告显示，政府上台一年后，约700万低收入家庭依旧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凸显了新政与基层现实之间的脱节。此外，政策效应存在明显的时滞，例如，2025年财政支出审查确立了在住房与教育领域的重大投资计划，但其成效需数年后方能释放。工党的种种表现削弱了公众对政府兑现社会公平承诺的信任，凸显了工党政府在当下英国积重难返境遇下的无能为力。

政策始终不触痛点、改革承诺与民众感受脱节，尽管统计意义上的危机已“缓解”，但社会心理和日常经验层面的危机却在延续，并进一步影响了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公众对主流政党逐渐失望，不满情绪日益积聚。这为改革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

（一）英国改革党的历史与转型

英国改革党的前身是脱欧党（Brexit Party），由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与凯瑟琳·布莱克（Catherine Blaiklock）于2018年创立。其核心目标是批判保守党政府的脱欧谈判策略，推动英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脱欧。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脱欧党以31.6%的全国得票率赢得29席，一度成为英国得票最高的政党，显示出其作为右翼民粹主义、单一议题政党的影响力。这也是英国改革党右翼民粹动员与组织网络形成的起点。在组织模式上，脱欧党采用了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注册支持者”制度，短时间内吸纳了约10万名注册支持者。在筹款层面，该党一方面依靠草根小额捐款，仅在成立后十天内便通过线上小额捐赠筹集约75万英镑，另一方面也获得大额资助者如前保守党金主杰里米·霍斯金（Jeremy Hosking）的支持，这种“小额+大额”双重筹资结构既巩固了其“草根”形象，又提供了大规模集会和广告宣传的资金基础。在领导结构上，脱欧党高度依赖法拉奇的个人号召力和集中化决策权，候选人遴选和政策方向均由核心领导层把控。这一阶段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使该党迅速积累了领袖资源、筹款机制、数据资产和志愿者网络，这都沉淀成为政治拓展的资源。

英国于2020年1月正式脱离欧盟后，脱欧党失去了主要的政治诉求。为延续政治生命，法拉奇与时任党魁理查德·泰斯（Richard Tice）将其更名为改革党。2021年，党魁泰斯提出“低税收、低管制”的经济主张，并在移民、反封锁和能源管制上强化与保守党差异化——为后来的全国动员明确了议题定位。此后党的定位从“脱欧单一议题政党”逐步转向“广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要反对疫情期间的封锁与防疫限制，主张“低税收、少管制”，批判移民规模过大与福利体系“过度依赖”，倡导“重塑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二）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及对英国政局的影响

2024年大选之后，法拉奇重返一线领导，并在2024年大选

发布《我们与你的契约》政纲，明确提出一系列简洁、量化的政策目标。在对传统两党的失望情绪背景下，改革党支持率显著上升，逐渐成为能够挑战工党与保守党的“第三极”力量。英国改革党全国得票14.3%，赢得5个下院席位，并在98个选区拿到第二名，609名候选人几乎覆盖英国绝大多数选区。英国选举研究相关机构估算，改革党的支持率约为32%、工党19%、保守党18%、自民党16%。这是自1973年以来首次有“非两大党”在全国等值票上领先的罕见情形。

大选之后英国改革党对英国两大传统政党构成了双重侵蚀。据民调分析，改革党的支持群体在社会文化议题上高度保守，例如强调移民控制、国家认同和传统价值观，但在经济议题上则更具“民粹化”的左翼诉求。改革党吸纳了大量2019年曾投票支持保守党的“脱欧派”选民，并指出，英国普通工人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政府应更多关注公共服务与生活成本^[6]。这种组合直接动摇了保守党“价值保守+财政紧缩”的传统叙事，使得保守党在右翼议题上失去垄断地位。

改革党对工党的“腹地渗透”同样显著。有专家基于选民调查数据和地理、社会经济统计发现，英国的贫困地区和政治极化地区的地理重合性较高。改革英国党在英格兰北部、东南沿海及部分曾为“红墙”地区表现较好，其支持者多集中在教育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质量下滑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选民表达了对工党在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的失望，部分选民将经济困境归咎于移民政策、福利制度或国家资源分配失衡，从而被改革党反对移民政策、反精英，并提出改革福利制度的主张吸引，这意味着改革党正在传统工党强区的贫困社区中实现突破。这种跨阵营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社会地理分布上，也在政策层面有所反映，例如改革党主张取消“两孩福利上限”（two-child benefit cap），这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经济左倾立场，但与此同时，该党在移民、英国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强硬表态，使其在文化议题上呈现出右翼保守主义特征。

这种“经济左、文化右”的意识形态组合，正在重塑英国选民结构，填补主流政党长期忽视的政治真空，并对两大党构成战略性挑战。总体来看，改革党的崛起改变了英国两党竞争的稳定局面。一方面，它以更激进的改革政策夺取保守党的传统支持者，另一方面，它凭借对贫困和福利议题的再政治化，切入工党长期占据的选区。这种“双重挤压”已经不再是边缘现象，很可能转化为议会层面的席位突破，从而加剧英国政党体系的裂解。

三、英国改革党的核心主张

英国改革党的迅速崛起并非偶然，除了生活成本危机的直接推动之外，也与其对英国社会问题进行精准捕捉和回应有关。

针对能源问题，改革党倡导能源自主，提出退出欧洲能源市场定价体系，废除并拒绝“净零”目标，称其为“最大的不负责任行为”，鼓励页岩气、核能、煤炭等“自主能源”开发。“能源主权”并非单纯的能源政策，而是一种政治动员语言。改革党将“领土/主权”与“生活成本”绑定，提出“我们应掌握自己的能

源、边境、核能、煤炭等”，强调民族能源开发权，呼唤民众民族国家情绪。另外，该党还奉行“气候激进主义”，拒绝气候议题中的国际协调，如碳交易机制或欧盟能源标准，强化气候问题对个人的危害，体现明显的右翼民粹的倾向^[7]。

针对家庭收入不足、住房成本过高的问题，改革党主张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与公司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让家庭有更多可支配收入。为了“让工作更值得”，减少依赖福利。改革党的减税政策具有明显的民粹经济自由主义特征，以“纳税人公平”为核心诉求，试图通过减负刺激经济活力。但该政策缺乏对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再分配正义的系统回应，“减税不等于增长”，激进的减税措施会牺牲公共服务质量，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改革党主张削减福利开支，强调财政节制与“纳税人利益优先”，批评福利“过度”，强调应减少福利依赖，转向“工作激励”导向^[8]。改革党将社会划分为“纳税人”与“依赖者”，强调前者受到政府的不公对待。它批评现行福利“过度”，强调应减少福利依赖，“我们不应该用勤奋纳税者的钱去奖励那些拒绝工作的懒人”，改革党声称现行福利国家模式“被滥用”，渲染“腐败国家侵吞民脂民膏”的形象，利用“庞大福利机器效率低下”论述来攻击工党和保守党立场，但这种强调“对立”思维易进一步加剧边缘人群的贫困和社会排斥，削弱社会团结。

改革党主张收紧移民政策，以国家利益为先。在具体政策上，改革党强调对合法移民推行技能积分制度、偏向“高技能、高收入”移民，对非法移民应直接进行驱逐，停止非法移民上岸申请庇护，优先保障英国本土就业，提倡英国公民应优先享有住房、医疗和教育资源。改革党将高移民率与“国家身份弱化”、“社会凝聚力丧失”挂钩，倾向于把“国家资源优先用于本国公民”作为正当诉求，通过批评“精英容忍大规模移民”动员工人大众，这种“人民”与“外来者”二元对立的立场体现了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反精英的倾向^[9]。

改革党明确反对罢工，认为大规模罢工加剧经济困难，支持进一步限制罢工权力。这与主流政党的模糊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罢工问题上，保守党采取了一贯的反对态度，工党也态度模糊，二者都不明确站在工人一边，想保持“中间”选民的支持，这种不作为的态度凸显改革党“维持秩序”和“反精英”口号的实际性和实惠性，再辅之以充满气势的宣言：“工会只是精英机构，不代表真正的工人”“这些罢工扰乱了交通、学校、医院——是‘觉醒精英’和激进分子搞出来的”“工党和保守党都软弱无能，只有我们敢硬起来”，对民众来说极具诱惑力。

四、结语

改革党的主张虽然在可行性和科学性上受到质疑，但因其语言简洁、数字明确、承诺直观，恰好填补了传统政党政策迟缓、回应不足的空白，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性。生活成本危机与改革党的崛起，共同勾勒出今日英国社会的裂痕与转向。这场危机远非暂时的经济波动，而是深刻暴露了英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脆弱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改革党以“经济左翼、文化右

翼”的混合策略，成功触动了那些被主流政治长期忽视的群体，其崛起不仅反映民众对现状的愤怒，更意味着英国政治正进入一个多重力量博弈、共识难以凝聚的新阶段。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活成本、住房、能源与分配正义等核心议题，改革党所带来的冲击将持续发酵，甚至可能重新定义英国未来的政治生态。这场由民生困局引发的政治变局，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 [1]Resolution Foundation. “The Living Standards Outlook 2019.” Resolution Foundation Reports(2018).
- [2]Özlem On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in the UK: What Is to Be Done?” Labour Hub (2023).
- [3]Caroline Dewilde. “Explaining the Declined Affordability of Housing for Low-Income Private Renters across Western Europe.” Urban Studies 55.9 (2018).
- [4]John Stone, Emma Robinson, Chris Blackwell, and Matt Padley. “Debt, Pover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Great Britain.” Christians Against Poverty Report (2023).
- [5]Rory Hick and Miche á l L. Collins.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in the UK and Ireland: On Inflation, Indexation, and One-Off Policy Responses.”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3.1 (2024).
- [6]YouGov. “What Do Reform UK Voters Believe?” YouGov UK (2024, July 2).
- [7]David Bassens, et al. “Market Entitlement and the Foundational Economy/FE4 Metric after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 Foundational Economy Collective Paper (2023).
- [8]Claire Fourton. “Striking against and under Neoliberalism: The 2022 – 23 British Strike Spiral in Context.” French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0.1 (2025).
- [9]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